

打开博物馆的云端之门

■本报记者 张文静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博物馆、科技馆现实的大门被无奈地关上,但一扇扇云端的大门却意外地被打开了。

从今年2月开始,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科技馆与抖音、淘宝、腾讯、快手等平台合作举办直播活动,带着观众“云看展”。

目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已有多家博物馆陆续宣布恢复开放,但这些通往历史、文化与艺术殿堂的云端大门,却不会就此关上。

云游科技馆

“刚开始会有一些紧张,但马上就适应了。”3月9日,直播一结束,内蒙古科技馆辅导员石佳玉立即脱下了厚重的“宇航服”。汗水虽然打湿了衣服,但她仍难掩兴奋之情,这是她第一次通过直播的形式为观众服务。

从科技辅导员变身网络主播,对于石佳玉来说是第一次。通过直播形式带着观众“云游”科技馆,对于内蒙古科技馆来说也是第一次。

3月5日、6日、9日,内蒙古科技馆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融媒体直播平台上策划开展了“云游科技馆”直播活动。三期直播,总点击量超过54万人次。

疫情突如其来,给内蒙古科技馆这个“直播新手”准备的时间并不多。“我们只能一边做一边摸索。疫情期间,中小学不开学。抗疫是责任,科普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即使没有经验,我们也一定要去试一试。”内蒙古科技馆展教部副部长毛彦芳介绍说,“一开始,紧张是肯定的。第一场直播之前,我们反复拿着手机录制、演练、回看效果。好在我们的科技辅导员对展厅太熟悉了,一旦进入状态,就很流畅了。”

3月5日的第一期直播活动,科技辅导员们选择了科技馆“魅力海洋”和“生命与健康”展厅中的代表展品进行介绍。对于直播效果到底会怎么样,毛彦芳等人心里都没底。直到当天线上观众达到18.8万人,不少观众在评论区留言“讲得太好了”“还想看”,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毛彦芳说。

有了第一天的经验,后面的两期直播,辅导员们更加放松,更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在“探索与发现 创造与体验”和“宇宙与航天 科技与未来”展厅,科技辅导员亲身示范360度自行车、三维滚环等展品,带着观众一起进入1:1复制的“天宫一号”里参观,引得观众留言“过瘾”,表示“等科技馆开馆后,一定要亲自体验一把”。除了介绍展品外,他们还带着观众一起做当下热点做科学小实验,比如在家制作可以发射的迷你火箭等。

“辅导员们的状态越来越轻松,与观众的互动也越来越多。因为互动需要看手机,还有观众留言说,‘这个主持人怎么总看手机,是不是忘词儿啦?’‘特别好玩!’”毛彦芳笑着说。



①中国国家博物馆直播现场
②甘肃省博物馆直播现场
③内蒙古科技馆“云游科技馆”直播现场

图片来源:相关博物馆官网

为何这么火

内蒙古科技馆的直播活动,只是近期博物馆、科技馆“云游”浪潮中的一个。

2月14日,在B站直播间,木木美术馆的“被禁的艺术”直播吸引了大批艺术爱好者;2月20日至22日,在抖音App,“在家云游博物馆”直播持续了三天九场;2月23日,在淘宝直播间,近1000万观众跟着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八大博物馆“云春游”;3月1日,拥有1388年历史的布达拉宫也首次试水网络直播,开放了极少对外展览的馆藏珍品,一小时在线观看人数超百万,相当于其近一年的游客接待量……

云端的大门也通向海外。快手与大英博物馆合作,邀请金牌解说开启了中国直播夜,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便收获了200万快手“老铁”们送出的50万个赞;百度百科启动“行走的文明”直播项目,走进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的文森之家、巴塞罗那蜡像馆、马德罗丹小人国、埃舍尔博物馆等小众博物馆,1小时的线上游客总数量超过了百年以来文森之家的线下总游客量,是巴塞罗那蜡像馆全年总游客量的四倍。

“云游”博物馆、科技馆,为何会这么火? “博物馆是历史的浓缩、时间的凝结。疫情使人们无法前往博物馆进行在场体验,这种状况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候,只有

技术才能突破空间的约束,把博物馆‘送上门’,让博物馆里深藏的历史和文化走入千家万户,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千家万户走向博物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厉新建说。

除了疫情期间无法亲临博物馆外,直播云游也让大家发现了不少线上游览的好处,这也是火爆的一大原因。

“在周末和节假日,我们馆一天的人流量能达到1万人,展厅里比较拥挤、嘈杂,要想深入了解,体验某个展品,是不太容易的,听讲解的效果也不好。但在网上,你坐在家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看到展品、听到辅导员清晰完整的讲解。”毛彦芳说。“当然,线上游览也不可能完全代替线下体验。不少观众看完直播后,都表示以后一定要去实地操作体验一下。线上、线下活动是互相补充的。”

“疫情之前,不少博物馆、科技馆就已经开展了数字化工程,这次疫情刚好给了这些博物馆们集体展现数字化成果的机会,也深刻影响了那些没有进行数字化发展的博物馆。这一定会促进整个博物馆领域的数字化工作,对博物馆业更好发展也是一次集体教育和意识培训。”厉新建说。

这只是个开始

3月13日起,上海博物馆、上海科技馆、

常州博物馆、无锡博物院等陆续恢复对外开放。但此次疫情催生的直播云游等数字化新方式对博物馆业态的影响,却不会因此结束。

“用虚拟的、数字化的方式展现馆藏、解说历史、传播文化,不仅是疫情中的权宜之计,更应该成为长久之策。”厉新建说,“尤其是一些‘高冷’的博物馆,利用技术手段可以突破区域限制,让更多人熟悉、真正发挥‘博物’的作用,这才是博物馆应有的样子。博物馆要想更好地走入寻常百姓家,就要用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来展示和解说,要把沉重的历史转化为时尚的产品,让高高在上的文化变得平易近人、轻松活泼。”

“此次疫情让大家进一步看到了互联网对博物馆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说。但他强调,除了积极融合新技术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思维的转变,即把提供藏品展示服务转变为提供文化体验服务。

“当前博物馆的数字化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物的层面,仅仅是把藏品用数字化方式展示出来,还远远不够。应该更深入地挖掘博物馆资源,讲好故事、融入更丰富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开发虚拟形象、文创产品等衍生品。同时,可以把博物馆内容进行主题化。比如设计某一个主题,由几座博物馆联动,将线上游览、线下研学结合起来,让博物馆更有吸引力。”陈少峰建议说。

在厉新建看来,此前虽然一些博物馆已经做了数字化,但是大多没能建立起很好的展示平台,有些建立了展示平台但没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少部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没有有效地“带货”,这些都不能算最理想的状态。“博物馆如何以开放的态度让馆藏资源成为社会多元创意的源泉、创新的依托,如何跟上潮流培育和整合具有私域流量的播主或网红导游,如何让作为形式的技术和作为内容的文化之间更好地结合,如何让线上博物馆成为既愉悦身心又有追求意义的融合载体,如何让线上博物馆既赶了时髦又能在受众心里有所沉淀,凡此种种,也是不小的挑战。”

在如此的“云游博物馆”浪潮中,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的回应。比如用弹幕和评论的方式,带动了观众与讲解员、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打破了此前线上游览的孤独感;在讲解文物时,在直播页面上附上相关文创产品的购买链接,甚至请文创设计师出镜讲解,形成了从观展到购物的无缝衔接;不进展馆,没有文物,就在自家客厅用一部手机、一台平板电脑,也能吸引几十万人在线观看,在博物馆直播中走红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白雪松,被网友称为“文博界李佳琦”“西安窦文涛”。

淘宝直播负责人简柔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博物馆直播带来的大量曝光,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景区前来咨询合作,科技馆,甚至海外的博物馆,都已在洽谈未来几周的活动。

可见,“云游”浪潮已来,而它给博物馆、科技馆带来的转变才刚刚开始。

江城风雨见思小记

■蔡长培

望大江南北,一城巍巍。今朝环顾,鼠年春节追忆;静候佳音,万里长江盼横渡。

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自1月23日起,一则封城令、千万留汉人,三万“逆行者”、六十天鏖战,再次让这座城市载入史册。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过生活的真面目后,依然热爱它。”

60个昼夜奋战,多少人辗转奔波,虽不能亲眼目睹,却是感动非常。这场战“疫”,创造了“逆行者”三字新词。你们,擎起时代旗帜,逆行奔赴战场,冒极大之风险,视病患为亲人,用心倾力救治,方得今日硕果。

身旁亦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中有科学家,有实验员,也有研究生,还有实验员出身的期刊编辑。他们争分夺秒,夜以继日,与病毒抗争,与时间赛跑,在无声的实验台前阻击病毒,分析它们,认知它们,消灭它们。

他们“记不清自己在实验室究竟待了多长时间,只记得最多一天洗了5次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连续3天至凌晨3点才离开实验室”的经历。

查阅相关报道,“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及时向全球共享”,“在病原鉴定、病毒溯源、病原检测、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制、动物模型建立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进展”。

他们的语言朴实得近乎木讷,“这是一种新的病毒,对它的了解早一分钟,也许就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希望尽早筛选出治疗药物,研发出疫苗,找到疫病源头,挽救更多生命”,“如果不参加这场‘战役’,一定会后悔”。

无论窗外另一场风雨的来袭,他们依旧面无愧色,心无旁骛,我心坦然,不动如山,手中事不停歇,心中念不动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因工作原因,每日审阅诸多稿件时,如跋山涉水,如雨中艰行,如梦中惊醒,如危境得救,时有忘言,时有冥思,时有伤怀,时有激荡。淋淋文字,本我所愿,却被这些平淡如水、朴实无华的话语,不断冲击着心神,许多次躺下都很难马上入睡。

“我是党员,我是物业公司经理,我请战”“老同志腿脚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他们都是我们的前辈,我们该帮”,这是物业公司负责人的话。

“她发挥专业特长在日常预防和用药方面给予老同志专业指导”“她每天打电话了解详细情况,不断为他们加油鼓劲”,这是离退休专干在疫情期间的生活。

“我会在到岗前,向卡点的战友们了解当天的情况和注意事项,有针对性地作准备,避免出现慌乱”“我会在劝返居民时,先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然后结合实际情况给出解决办法”“对于实在无法劝返的,我会采取人盯人战术,即在保证卡点正常值守的前提下,陪同外出并送回”,这是青年党员的行动。

很多原本平日常里的小事,现在却让我打心眼里赞赏,我无法尽数这些“从未有豪言壮语,行动却掷地有声”的人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真真切切的坚守,秉持“服务好科研人员,是我的职责所在”的信念,“和科研人员一起奋斗到最后,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

还有更多的感动扑面而来。2月20日,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援鄂医疗队“七勇士”赶赴武汉。读完30天来七勇士的每一篇《援鄂日记》,已泪眼婆娑……3月19日,我们去七勇士驻地看望,他们居然说“我们来晚了”,我安慰道,“都是一样的辛苦”。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封城第60天,停笔之际,心情仍无法平复。看见太多,听闻太多,触动太多,感恩太多,无以尽述,难以尽言。惟略记一二,以为纪念。(作者单位:中科院武汉分院)

说史

伦敦大瘟疫与公共卫生制度的创建

■杨靖

英国近现代制度真正的变革不在于王室,而是历经大瘟疫(以及伦敦大火)的洗礼淬炼出的行政机构及其公共服务体系——也正是这套体系,成为创建英国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真正的幕后推手。

伦敦大瘟疫是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在英国的一场大规模传染病(鼠疫)事件,超过八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继14世纪黑死病之后伦敦遭遇的最严重的瘟疫。雪上加霜的是,遭瘟的同时伦敦又遭遇大火,导致数十万居民无家可归——伦敦由此一度被称为“覆巢之下的飞鸟”。根据英国小说家笛福在《瘟疫年记事》(1722)中的记载,瘟疫暴发前数年,市面上流行的《占星预言》早已让伦敦居民惶恐不安。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日记中有关于“市民对昨晚的彗星议论纷纷”的记载。同时,星相学家威廉·利更预测到代表“战争、饥荒、死亡或瘟疫”的月食即将来临——益发加剧了城中居民的恐慌。当然,这些所谓预言、预测包含了很多社会因素,并不是基于科学的判断。

瘟疫出现不久便开始迅速蔓延。清教作家托马斯·文森特在《城市中上帝的可怕之声》(1667)中曾作过形象描述:“秋天到来时,人们就像那落竹,被可怕的风所播撼……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丈夫和妻子共赴黄泉,也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父母携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踏上死亡之路。”之后每周死亡人数继续攀升,高峰期死亡人数达到每周七千人。到九月上旬,原本的欧洲第一大城市已然变为一座死城。

面对传染病的侵袭,数十万伦敦居民猝不及防,其中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行会学徒、男女仆人以及贫民和流浪汉等,境况最为凄惨(因为穷人是主要的染疫者,因此瘟疫又称“穷人病”)。据记载,一户贫民母女一同感染瘟疫,因无钱治病,结果母亲发疯杀死婴儿后自杀。而当时的法令规定,家中一旦有人感染不治之症,必须立刻加以处置——“看守破门而入,将奄奄一息的病人扔上运尸车。这些尸体被埋入墓地时甚至尚有余温。”——笛福笔下人物曾亲眼目睹一位中年男人,在妻亡后潜入墓地,甘愿随家人一同活埋。瘟疫中的伦敦真可谓人间地狱。

瘟疫引发大逃亡。率先出逃的是英王查理二世,他携王室内廷整体搬迁到牛津。紧随其后的

是教士、律师以及学者——其中包括艾萨克·牛顿(他在此期间完成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由于出逃之人可能携带鼠疫,使得周围城镇的人惊恐万状。他们在当地治安官员带领下成立自卫队,采取关闭河道、封锁城门、把守交通要道等措施,将难民拒之门外,甚至投掷石块驱逐他们出境。出于对瘟疫的无端畏惧,所有来自伦敦的信件在阅读之前都要先放到水中漂洗或火上烘烤——“瞥一眼伦敦人戴的扁平帽或衣服衬领,会令整村的人不寒而栗。”据说,当一名垂死的伦敦人爬进城外一所农场小屋时,当地人立即挖出一道深坑,将整座房屋连同病人一起埋葬。这一举措很可能启发了伦敦附近城镇艾文姆的居民——他们非常前卫地采取“封城”措施:拒绝伦敦商人进入,断绝和外界的一切往来。他们成功地阻止瘟疫进一步向伦敦以北传播,不过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四分之三的城镇居民死于这场瘟疫)。

二

有鉴于此,留驻伦敦的主要行政管理的人员——伦敦市政府参事、行政官员以及医疗救护人员等,在伦敦市长劳伦斯爵士的率领下,以枢密院名义发布抗击瘟疫的第一道命令:瘟疫死者的家属必须在房间内自行隔离40天。这一决定引发伦敦民众的强烈反弹,有限的警力根本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死者家属在亲友的帮助下,制

服守卫,涌向街头,混入人群之中。由于疫情开始大面积扩散,枢密院被迫采取更为严厉的举措,即“按区隔离”,同时宣布所有居民严禁外出自由活动,由医生、药剂师和神职人员组成的“鼠疫医师”上门服务。苦于医疗人手及资源严重不足,政府号召伦敦普通民众发扬互助精神,展开自救行动——自发清洁居民区环境卫生及维护社会秩序,使之成为行政机构应对危机各项举措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合力也使得疫情逐步呈现好转之势。

伦敦行政机构对抗瘟疫强有力的领导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60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被瘟疫感染人群的管理法案”——该法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认:将被感染人群隔离在住所之内乃是合法行为。1665年初,当疫情初现之时,伦敦市长便依据该法案及时制定且公布实施了详细的防疫措施:首要一点是组建相关的领导机构以及厘定其具体职能,由此迅速建立起郡、教区两级防疫机构,从而形成较为严密的疫情监控体系。在疾病管控方面,其具体规定则包括以下事项:疫病通报(有专人负责登记)、病人居家隔离(医护人员上门)、焚烧被感染者衣物、保持室内外通风;此外,感染者房屋必须加以标记,每户加派守卫,招募志愿者尽快掩埋死者。在净化环境方面,则有以下举措:街道保持干净,垃圾及时清理,路面喷洒香水。在食品卫生方面,则规定禁止食用鱼肉及发霉变质的食品;对酒馆严加管制;禁止举行公共葬礼;禁止各类游戏、聚会,以及“所有游戏、逗趣表演,娱乐竞赛,民谣演

唱、圆舞游戏”,或诸如此类的大规模群众集会——违者由各教区严加惩处。

总体而言,当局多管齐下的政策举措对于镇抚人心、缓解恐慌情绪产生了良好影响,也取得了不俗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亦存在不足之处。比如疫情蔓延过程中,约克大主教(以及远在梵蒂冈的教皇)决定举办弥撒撒为伦敦百姓祈福——市政当局明知人群聚集,会出现大面积感染,却并未加以阻止,结果祈福不成反增祸害。再比如,尽管官方计划有组织地处理尸体以防疫情扩散,但毕竟人力有限,因此仍有不少遗体被弃置路边,严重污染环境。还有,由于一开始未能认清病源,市政当局下令扑杀所有猫狗(这一愚蠢决定后被证实徒劳无功,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鼠辈”反而因为天敌的消亡而变得日益猖獗)。不仅如此,出于“消除瘴气”的良好愿望,当局发出指令要求日以继夜在城区内燃烧大火(不久引发真正的伦敦大火),并在街头焚烧辣椒、啤酒花和乳香等具有强烈气味的物质;甚至敦促市民吸食烟草以吐出烟雾,希望以此抵御病菌的散播。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行政官员专业知识的匮乏导致了“胡乱作为”,不仅耽误了疫情防控工作,也造成了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

三

痛定思痛,英国政府在史无前例的大瘟疫中

逐步认识到,政府的医疗救治是辅助性的功能,更重要的在于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健全并完善卫生防疫体系,从而推进公共卫生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事实上,在疫病期间,除隔离之外,伦敦市政府已经着手构建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安排专业人员“下沉”到居民区进行诊疗,发起志愿者清扫街道的“清洁运动”,编制每周死亡人数统计报表(以便及时了解疫情动向与规律),等等。

此外,大瘟疫也使得行政当局注意到民众的配合与支持是各项政策成败的关键。比如散居在伦敦旧城的乞丐和流浪汉,其中部分人选择强行出逃等方式来逃避隔离或恶惩报复社会,造成极大危害。而解决之道,唯有全力施救(“应收尽收”),方能化解危机。其实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便通过《济贫法》法案,将每户必须缴纳的“普通税”作为济贫基金,对乞丐和流民进行救济——此举也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历经瘟疫的“大考”之后,英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在社会保障和救济方面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英国近现代制度真正的变革不在于王室,而是历经大瘟疫(以及伦敦大火)的洗礼淬炼出的行政机构及其公共服务体系——也正是这套体系,成为创建英国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真正的幕后推手。毋庸讳言,瘟疫是人类文明发展如影随形的衍生品——在灾难祸面前,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所有优势和缺陷都会暴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瘟疫在危及英国国家生存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现代社会——专制集权的堕落在笛福的《瘟疫年记事》中被视为瘟疫的起源。同时,在王权(逃离)缺位、政府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伦敦民众在自救互助的实践中不仅实现了个人主体性,而且与留守伦敦的市政当局及技术官僚阶层共同创建出一种崭新的社会共识。上述包括有组织的隔离制度、疫情上报制度、环境卫生整治制度以及及时的医疗救助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实践及共识,由此也成为此后西欧乃至世界各国公共卫生防疫体制的模板与典范。(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